

2020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 研究报告

2020 Global Educational
Think Tank Influence
Evaluation PAP Report

长江教育研究院 | 方略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quareStrategics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研究报告

长江教育研究院 | 方略研究院

目录

一、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研究背景	4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6
(一) 决策 (POLITICAL) 影响力	8
(二) 学术 (ACADEMIC) 影响力	10
(三) 大众 (PUBLIC) 影响力	11
三、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13
(一) 全球教育智库名单的确认	13
(二)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14
(三)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	20
(四)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局限性	21
四、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22
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外教育智库的表现	25
六、结语	29
附录	29
长江教育研究院	29
方略研究院	30

基于全球视野进行教育智库评价既是在全球教育智库评价中发出我国教育智库声音的重要方式，也是审视我国教育智库发展现状、明晰国内教育智库与国外领先教育智库之间差距，进而找到可以学习、借鉴的标杆和榜样的重要举措。为有效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建设成果，帮助国家总体把握教育智库发展态势，促进各教育智库找准位置发现不足，向社会各界展示教育智库的形象和实力，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方略研究院于 2019 年联合长江教育研究院组建全球教育智库评价课题组，对全球教育智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智库等展开评价研究。本报告是课题组第 2 份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年度报告。

一、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研究背景

作为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教育智库建设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及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教育智库的不断发展，如何培育新型智库，发展面向国际、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智库，成为当下我国教育智库的又一发展目标。而研究国际教育智库的发展特点，借鉴国际优秀智库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可以为我国教育智库发展增砖添瓦。

教育智库，主要指有关专业人士开展公共教育政策研究，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机构。从世界范围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教育智库便开始在世界各地兴起，其中，美国教育智库在功能、数量、种类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美国智库起步于 20 世纪初期，最初致力于公共政策的研究。随着智库数量和功能不断发展、完善，教育智库在美国应运而生。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国教育智库开始进入萌芽时期。1957 年，随着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

苏联科技一度超越美国，引发美国高层人士对教育落后导致科技落后的强烈反思，政府因此开始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先后出台了各种促进性政策措施¹。除此之外，20世纪中期的“反贫困战争”促使智库的研究重心向关注国内政策转移，尤其是1983年《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报告发布后，美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关注教育政策领域的智库也由此大幅增长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教育智库为国家提供制定教育政策的方案，评估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推动教育政策辩论，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颁布以来，我国智库建设进入新时代，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但质量参差不齐，如何衡量智库建设成果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国家而言，智库评价有助于国家总体把握智库发展的形势，有针对性地出台支持智库发展的政策；对于智库而言，智库评价不仅有助于智库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还有助于智库之间在竞争、学习中发现不足，激发智库持续发展的动力；对于基金会、媒体、学术界、社会大众而言，智库评价有助于展示智库行业和个体的公共形象。

为有效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建设成果，帮助国家总体把握教育智库发展态势，促进各教育智库找准位置发现不足，向社会各界展示教育智库的形象和实力，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方略研究院联合长江教育研究院组建全球教育智库评价课题组，对全球教育智库展开评价研究。

¹ 李清刚.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演变及特点[J].教育学术月刊,2017(02):27-32+75.

² 赵章靖,邢欢.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过程、趋势与特征[J].世界教育信息,2016,29(04):5-11.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由我国教育智库研制具有全球视野的教育智库评价，既是在全球教育智库评价中发出中国教育智库声音的重要方式，也是审视中国教育智库发展现状、明晰国内教育智库与国际领先教育智库之间差距，进而找到可供学习、借鉴标杆和榜样的重要举措。但如何构建国际、国内可比，且能恰当反映智库水平的指标体系，仍是本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课题组梳理发现，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评价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发布的《MRPA 测评报告》、长江教育研究院、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评价中心（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联合南京晓庄学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智库评价 SAFI 研究报告》等智库评价，均将影响力作为评价智库的核心指标之一。

一定程度而言，影响力既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评价智库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智库评价最为核心、应用也最为广泛的指标之一。

“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但与控制力、力量、强迫和干涉截然不同。它通过告诉其他人行动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对他人有利的，或者是道义上以及善意的考虑，来对其行为进行影响，但是这些理由和考虑必须是对他有分量的，从而影响其决策。”³在思想竞争自由的市场上，智库的成功不是以利润的多少来衡量，而是取决于产生了多少影响力，其影响力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⁴，最终推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³ 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02):13-18.

⁴ 王桂侠,万劲波.基于政策过程的智库影响力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151-157.

根据学者加尔东（Johan Galtung）的理论，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分成三个层次，即决策核心（decision -making nuclear, DN）、政策中心（center）和政策边缘（periphery），如图 1 所示。其中，智库就属于政策中心层范畴，面对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参与者，智库内的研究院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并通过与决策核心层、中心层和边缘层等三个层次中的各个参与者进行互动，进入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出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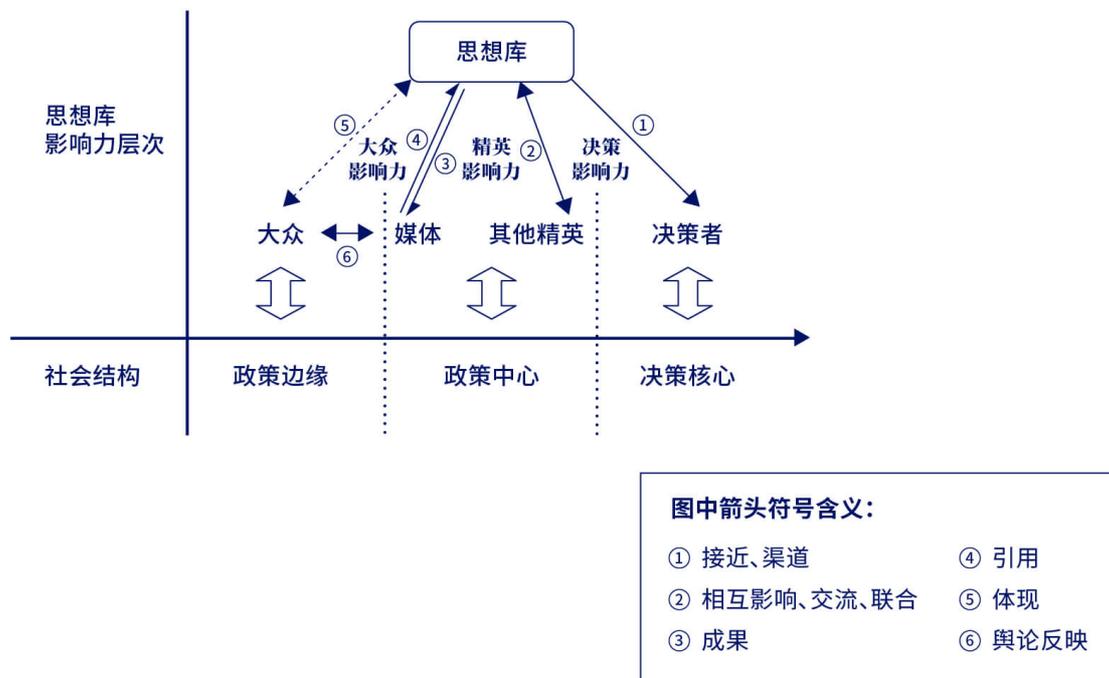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结构与思想库影响力（根据加尔东理论框架重新制图）

鉴于此，课题组以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从决策影响力（political influence）、学术影响力（academic influence）和大众影响力（public influence）等三个层次（三个维度的英文首字母连在一起，即组成“PAP”）对全球教育智库进行评价研究。

（一）决策（Political）影响力

决策影响力是指智库专家参与政策导向、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或政策评估，为决策者提供专家意见、辅助决策的能力。智库通过委托研究、国会活动、政府决策顾问等方式，与政策决策机构之间建立起正规或非正规的沟通渠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供给决策者，使其愿意抽出时间来关注其研究成果，并最终采纳其建议⁵。这是思想库为了试图影响政策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然而，评估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具有相当难度。每个国家或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一个经过众多利益相关者商讨、博弈的复杂过程，且极少有政府会将特定政策的推行明确归功于某一智库，因而很难明确单一智库的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克服难以直接衡量智库建议是否直接推动某项政策的困难，课题组以智库与政府及决策者的关系作为二级指标，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由于高层领导们工作繁忙，几乎没有阅读时间，因此如果智库仅以学术研究姿态，就论文与其沟通，显然是无效的，最好的方法是在小型会议上亲自向领导呈上言简意赅的研究成果，而这取决于智库能否通过其卓越的人脉关系接触到领导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库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其决策影响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际网络在美国的政治机制中就尤为重要。在美国，每隔4年很多卸任的官员都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流通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得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以布鲁金斯学

⁵ 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24.

会为例，该学会现任 200 余名研究员中，约 1/2 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 6 位之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有 36 人之多。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建议可以迅速到达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机构，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影响⁶。

由于政治体制、基本国情的不同，“旋转门”机制在我国实行较为有限，但在国内也已出现了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现象。特别是隶属于我国党政机关的官方教育智库，凭借自身独特地位，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接触机会多，成果上呈通道顺畅，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多⁷。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和民间教育智库的职员也在政府中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政府高层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卸任的高级官员。因此，以智库与政府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衡量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二级指标，不仅适用于中外智库的现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便于收集到相对客观的数据。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以“核心成员曾任或兼任国家/联邦级或省部/州政府官员等级”作为三级指标，同时考察智库获得内参、批示和承担政府课题的数量，辅以智库发布的具有高影响力、特别是有国际影响力和政策参考效果的报告，来综合判断全球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

⁶ 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02):14.

⁷ 周洪宇. 智库的转型[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6.11.

（二）学术（Academic）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是指智库机构或专家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同行及其他社会精英的能力。学术影响力是智库综合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深厚的学术能力和知识积淀作为根基，智库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养分为现实政策出谋划策。正如陈媛媛所言：“智库要提供思想和智慧，需要有潜心的学术研究，才会有创新的思想 and 解决问题的智慧；解决当前的政策决策不能仅仅从当前社会问题出发，还要结合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来决策，通过学者的研究，历史可以昭示现实，从而避免决策者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⁸从现实意义来看，智库如果能够说服其他社会精英赞同并支持自己的政策观点，同时能够联合其他智库和研究机构一起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那么其政策观点也更容易成为中心阶层的主流观点，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核心。

课题组从论文、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等三个层面来评估全球教育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论文指标选取的是近三年署名为该教育智库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学术引用量越高，一方面说明智库发表的论文所得到的来自其他学者及机构的认可度越高，证明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机会越大，可能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力越强。选取研讨会作为衡量教育智库学术影响力指标之一的原因在于，研讨会多由专业人士参加，受众面更窄，学术认可度也更强，能够反映出举办研讨会的智库在专业领域的活跃度与学术认可度，从而体现出该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而选取连续出版物作为评估教育智库学术影响力指标之一的原因在于，是否拥有连续出版物可以反映智库在学术成果方面

⁸ 陈媛媛.智库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7,37(12):60.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过，课题组在此处仅会对智库连续出版物进行量化评估，不对其出版物的优劣进行评价⁹。

（三）大众（Public）影响力

大众影响力是指智库在与媒体及公众的互动中影响大众对某一政策看法，扩大智库政策宣传舆论影响力的能力。有学者曾专门探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成因¹⁰，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尤其注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政府、公众进行信息沟通，建立了官方网站、博客、播客，并在主要社交媒体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上开设账号进行信息发布，更新速度也较为迅速，且善于将专业研究报告术语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社交媒体语言，从而实现社交媒体信息发布的专职化和专业化。由此可见，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平台，是智库提升自身大众影响力、塑造舆论影响力的有力手段，对其引导和影响政府、公众对议题的深度认知，推动议题建构具有一定价值。

根据网络传播平台的不同，课题组将大众影响力分为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等三个二级指标。搜索引擎指标指的是在百度、谷歌（Google）两个中外主要搜索引擎上某一教育智库全称或简称的搜索量。社交媒体关注量指标关注教育智库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粉丝数：针对国外教育智库，考察的是智库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的官方账号的粉丝总数；针对国内智库，则考察其官方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总数。官方网站二级指标则是通过考察相关教育智库网站的 Alexa 全球和地区排名来进行衡量。

⁹ 费雷德·昆斯,刘柯兰,冯胜,郑吟秋.智库的传播与影响力指标[J].决策与信息,2016(08):98.

¹⁰ 相德宝.新媒体时代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探析[A].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18年度）[C].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8:18: 589.

综上所述，课题组在参考已有智库榜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研讨、实践，确定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值）	数据来源
决策影响力	与政府及决策者关系 (旋转门经历)、内 参、承担课题、政策影 响力等		教育智库官 网、专家打分
学术影响力	论文	近三年署名为该教育 智库的论文篇均被引 数	微软学术 (Microsoft Academic)、 中国知网 (CNKI)
	研讨会	近三年召开研讨会数 量	智库网站报道
	连续出版物	是否有连续出版物	智库网站报道
大众影响力	搜索引擎	教育智库全称/简称 的 Google 搜索量	Google Ads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值）	数据来源
		教育智库全称/简称的百度搜索量	百度推广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影响力和关注度	脸书 (facebook) , 推特 (twitter) , 微博, 微信
	官方网站	独立网站的官网流量 (独立一级域名)	Alexa 全球排名, 地区排名

三、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一) 全球教育智库名单的确认

本研究中的教育智库包括国际智库名单、国外智库名单和国内智库名单。

国际智库名单来自于代表性国际组织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等，共计 5 家。

国外智库名单参考了 2019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排名（*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专项排名——Top Education Policy Think Tanks、2017 年清华大学智库大数据报告等国际智库的榜单报告以及各国官办国家级教育研究机构。课题组从中遴选出涵盖主要国家并以教育为主要研究领域或有专门教育研究团队的教育智库共计 61 家。

国内智库名单主要来源于国内各大智库排名和研究报告（南京大学 2015-2016 和 2018、上海社科院、清华大数据、浙大、周洪宇和刘大伟《中国教育智库评价 SFAI 研究报告（2019 版）》中出现的教育智库。课题组最终遴选出代表性教育智库共计 14 家。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1	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	国外
2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	国际
3	美国城市研究所	国外
4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5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	国际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	国际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8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国外
9	美国卡托研究所	国外
10	美国 SRI 国际公司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11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分析中心	国外
12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	国外
13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国外
14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国外
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国际
16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国外
17	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	国外
18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国内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国际
20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国外
21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国外
22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国内
23	美国教育政策与数据中心	国外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24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国外
25	美国教育信托基金会	国外
26	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价中心	国外
27	印度国家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	国外
2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29	土耳其教育改革倡议	国外
30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国内
31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国内
32	新西兰教育研究委员会	国外
33	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34	哈佛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中心 (研究生院)	国外
35	英国教育政策研究所	国外
36	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	国外
37	韩国教育开发院	国外
38	芬兰教育研究协会	国外
39	科鲁尼亚国际教育政策、规划和管理研究所	国外
40	塞尔维亚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41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国内
42	斯洛文尼亚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43	芬兰教育研究院	国外
44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国内
45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	国外
46	荷兰 SOCIRES	国外
47	亚美尼亚教育和培训部	国外
48	克罗地亚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国外
49	俄罗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现教育管理學院)	国外
50	匈牙利教育政策分析中心	国外
51	长江教育研究院	国内
52	立陶宛教育策略中心	国外
53	阿塞拜疆教育创新中心	国外
54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国家学习成果评估所	国外
55	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	国外
56	美国国家教育评估改进中心	国外
57	弗吉尼亚大学柯里分校教育政策和劳动力竞争中心	国外
58	乌克兰教育研究中心	国外
59	布朗大学安纳伯格学校改革研究所	国外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60	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	国外
61	德国科学审议委员会	国外
62	英国教育基金会	国外
63	乌克兰国家教育科学院	国外
64	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国内
65	美国赫金杰教育与媒体研究所	国外
66	伊曼尼(IMANI)政策教育中心	国外
67	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国内
68	爱沙尼亚政策研究实践中心	国外
69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国内
70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71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国内
72	格鲁吉亚研究和教育网络协会	国外
7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74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教育高级研究中心	国外
75	美国创新教育研究所	国外
76	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	国外
77	马其顿公民教育中心	国外
78	阿尔巴尼亚民主教育中心	国外

2020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79	吉尔吉斯斯坦教育倡议支持基金会	国外
80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	国外
注：相关数据收集、整理截至 2020 年 7 月		

与 2019 年评价结果相比，美国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全球排名前 10 的教育智库中，共有 7 家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美国城市研究所分列第 1、第 3 名。但美国教育智库的领先地位已经受到来自国际教育智库的“挑战”，除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继续位列前三，且较去年上升 1 位至第 2 名以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第 5 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第 6 名）也成功入围全球前 10 名。全球前 10 名教育智库的位次与去年相比多有调整，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依旧位列第 5 名。

14 家国内教育智库也在影响力方面展现出良好的上升势头。与 2019 年评价结果相比，仅有 3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有所下滑，1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持平，足有 10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上升。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提升 26 位，成功入围全球前 20 强（第 18 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也提升 26 位，升至全球第 22 名。这两家排名升幅一样的智库分列国内教育智库前两名，而排在国内教育智库第 3 名的则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位列全球第 28 名。

(三)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

从决策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教育智库中均存在智库领导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机制，但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教育智库，我国教育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并不健全，在现实中倒存在个别由行政人员转至教育智库的案例，如山东省教育厅原一级巡视员张志勇选择到高校工作，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受教育部党组安排，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原副司长彭斌柏转岗至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但由教育智库转至政府部门的案例则十分罕见，不及美国教育智库频繁。除旋转门机制外，国际知名教育智库还曾发布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告，推动本国乃至世界层面的政策制定与推行，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确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排名、教育立法、政府决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大部分国内教育智库虽积极为政策建言，发布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报告，但总的来说在影响力上仍有所欠缺。

从学术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近三年发表论文数前三位的国外教育智库，同时也是近三年被引数最高的三个国外教育智库；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篇均被引数前三位的国外教育智库。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是近三年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三家国内教育智库；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近三年被引数最高的三个国内教育智库；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东北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是篇均被引前三位的国内教育智库。在发文量上，国内教育智库与国外教育智库差异不大，但在引用量上尚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14家上榜国内教育智库的篇均引用量与国际优秀教育智库之间还存在差距。

从大众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教育智库在社交媒体影响力上的表现存在明显差距。国际教育智库比较重视社交媒体的力量，基本每个智库都有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账号，且账号基本很容易在官网上被找到。而14家上榜国内教育智库无一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全部开通，相对而言，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开设情况稍好些，共有8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数排在前三位，但仅有5家国内教育智库开通了官方微博账号。有的国内教育智库的官网常年不及时更新，未能通过官网这一自营渠道及时将自身形象展现给公众，甚至有的教育智库连官网都一直未曾开通。相比之下，国内民间教育智库更加注重大众影响力的辐射，其微信或微博的开通率和粉丝数都要高于其他国内教育智库，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微信和微博粉丝量的得分均较为靠前。

（四）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影响力作为从心理上促成对方改变想法的力量，很难被具体指标所量化，这在决策影响力评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评估智库政策影响力，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四川省科院发布的报告均采用“专家评议”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各智库在业内权威人士心中的影响力，

但却无法避免打分专家的主观性。本报告在专家打分之外，同时采取了智库人员旋转门经历和内参、批示、承接课题数量等为指标，希望力图科学评价智库决策影响力，但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力难以量化、数据匮乏、评判主观性等问题的制约。

其次，在学术影响力评估方面，虽然课题组通过在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和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检索近三年署名为相关教育智库的论文被引总数和论文发表总数，可以实现量化评估，但一方面，统计到的具体论文数据受制于这两个数据库的完备情况，可能有所疏漏，另一方面，也只检索了以英文或中文发表的论文，未检索以其他语言发表的文章，不排除有部分智库的论文成果由于语言因素而被遗漏统计的情况。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的数据是课题组根据智库网站报道进行人工统计而得，可能有所遗漏。此外，由于难以从质量上对智库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进行评判，课题组只关注数量，此举存在一定局限性。

最后，在大众影响力评估方面，一方面，不排除部分教育智库的官方微博或微信账号不以其智库全称或简称形式存在，因而可能导致课题组统计数据出现遗漏。另一方面，课题组通过 Alexa 全球和地区排名统计智库官网流量只能统计到一级域名，无法统计到二级域名，因此可能导致部分智库的官网流量数据出现遗漏。

四、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不管是提升国内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还是提升其学术影响力，抑或是提升其大众影响力，基本出发点均应从提升国内教育智库的产出入手，因为如

果不加强源头建设，将过多精力投入到渠道建设，就是舍本求末。当前，我国教育智库的成果存在以下值得改进之处：一是不少教育智库是高校研究机构伴随“智库热”临时转型而成，成果范式仍以学术研究为主，而未完全转型成功，尽可能多地产出适合政府部门需求的政策研究；二是政府部门希望教育智库产出以数据为支撑的研究成果，以便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持，但我国教育智库的实证研究水平仍需加强，特别是缺乏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三是政府部门所提出的政策研究需求是基于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一些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难以依靠单一学科理论予以解答，理想情况下，如能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将更能满足政府部门的决策需求，但现有国内教育智库的研究团队主要还是以教育学科背景为主，缺乏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当然，已有部分教育智库通过采取聘请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方式，试图解决研究团队跨学科色彩不足的问题，但受制于经费、考评等因素影响，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建议：一是从考评机制入手，支持获得一定级别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在启迪民智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政策研究成果也能纳入智库研究人员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体系中，但要注意的是，也不能“唯批示”、“唯阅读量”，而要在同行评审的大框架下，科学、公正评价智库研究人员的政策研究成果的质量，避免造成新的不公平。二是从团队建设入手，在组建教育智库研究团队的过程中，注重提升团队的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色彩，一方面，可以在招聘时对于具有以上背景的候选人有所倾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教育智库可以依托学校主要领导牵头，将教育智库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具备实证研究优势的其它智库组成“智库共同体”，开展协同创新研究。三是从人才培

养环节入手，注重招收来自其它学科的学生，将他们培养成为经历扎实实证研究训练、有志于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教育智库后备力量，在这方面，本就隶属于高校、又拥有研究生招生培养资格的教育智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提升教育智库产出的同时，为了提升我国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我们建议，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变部分政府部门等“用库者”对于教育智库的态度，让他们重视起教育智库对于教育科学决策的重要价值，一方面，教育智库专家可以充分利用给各地政府部门培训、交流、座谈等机会，向他们宣传、推广教育智库的形象，普及教育智库之于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与教育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理应在依托教育智库科学制定具体教育政策方面发挥出示范带头作用，为下一级教育行政部门作好榜样。

根据我国教育智库的当前实际，由于不少教育智库均为高校研究机构转型而来，其基本范式仍是学术研究，所以在三个影响力之中，如何提升学术影响力应是最不值得我国教育智库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但现在我国教育智库仍需要重视提升自身学术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如前文所述，提升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色彩，另一方面，则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借助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海外朋友圈，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为实施公共外交，加强中外人文交流，输出中国声音和中国标准，树立中国在全球教育的话语权，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属于中国教育智库的应有贡献，在此方面，可以考虑的对策包括鼓励智库研究人员加强在海外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与国外教育智库通过联合举办研讨会、互访交流、联合科研攻关等形式加强合作交流。

大众影响力也是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建设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目前，国内多数教育智库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咨政”方面，而较少顾及“启民”上，这背后既有主观原因，也受客观因素的制约，集中反映在教育智库的对外传播渠道存在渠道建设不健全、重建设轻运营、表达方式不受关键受众群体欢迎等问题。对此，我们建议，我国教育智库可考虑从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分别入手，提升大众影响力。在自有渠道建设运营方面，我国教育智库需要首先确保搭建、运营好自身官网，如有条件，还可以建设英文网站；其次，应适应媒体发展潮流，在建设、运营好以图文内容为主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自身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传播阵地建设工作；最后，可借鉴一些国外教育智库的经验，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公众进行分层化运营，将一部分关键受众发展为订阅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其定期发送邮件，推介智库研究成果。而在合作渠道建设运营方面，我国教育智库一方面可考虑加强与广播、电视媒体及新媒体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主动和媒体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重大政策发布、应急事件处理等关键时刻，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在媒体发表文章等方式，主动引导舆论。

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外教育智库的表现

除了开展数据搜集、整理、统计之外，为研制本报告，课题组还对部分上榜教育智库开展了个案调查，发现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多家国内外教育智库均有所动作，发挥出智库咨政启民的作用。

教育智库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类别，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提供决策服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反映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鉴于疫情之下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领域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教育智库研判形势，就防控工作中的教育应对以及疫后教育发展改革等现实问题积极建言，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提升了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如针对疫情下的全国统一高考是否延期的问题，长江教育研究院就向教育部报送了《关于推迟湖北省高考开考日期的建议》；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冲击，方略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联合撰写、报送《关于“适度扩招第二学士学位生 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提交了特殊时期教育领域发生的“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职工居家照料未成年子女”、“中小学卫生室医务卫生人员在线培训”、“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健康素养”、“重大疫情时弱势群体学生处境”等方面的问题及建议；截至2020年3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已向中央办公厅、教育部分别报送相关政策建议29篇，向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报送政策建议7篇，向民进中央报送相关报告9篇，其中多篇报告被采纳或刊发。

相对于集中向本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政策建言的国内教育智库，部分国外教育智库则立足全球视野，通过推出研究报告的形式为各国政府提供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Rebecca Winthrop 于2020年3月发布研究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学校关闭：各国可以从过去的紧急情况中学到什么》，向各国政府提出包括动员教育网络传播挽救生命的公共卫生信息、计划将停课时间持续到数月而不是数周、考虑意外后果并找

到减轻其后果的方法、建立更好的学校在内的政策建议。再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Patrick Hannahan 于 2020 年 4 月通过发表《以适应新冠病毒的方式进行高质量的教育》一文，向全球公众推介了多个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教育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尝试提供高质量教育的举措、做法，包括博茨瓦纳非政府组织 Young Love 在地方政府关闭学校后，迅速动员起来，收集了 1 万名学生的手机号码，以提供短信指导和热线电话，回答学生父母和学生本人的问题；坦桑尼亚非政府组织 CAMFED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社区中的家庭合作，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和政府的官方指导，并在学校关闭期间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和相应指导。

除开展应急研究，为服务于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言之外，我国教育智库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自身学术研究职能，开展学术抗疫，提升了智库的学术影响力。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在 3 月 8-12 日调查了全国 2377 名中小学教师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类型、对在线教育技术的接受度以及对在线教育的认可度等情况，得出了“学段上初中教师对在线教育的认可度最高”等研究结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在清华大学开学第一周即启动应急研究项目“清华大学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研究”，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包括提出“文化驱动的政策模型”这个概念来解释和说明清华在线教育教学的政策行为，展现了清华历史文化传统、校训、校风、学风、仪式等在整个在线教育教学政策过程中的激励、引领和支撑作用。针对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张志勇、杨玉春、张玲玲、王新波、徐继红从政府、学校、教师等不同层面入手，研究提出了在工作机制、专家队伍、

资源建设、家校协同等多个方面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教育系统“战”疫工作延伸的建议。针对此次疫情对于医学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邀请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教授，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教授等有关专家召开新时代医学教育发展改革研讨会，形成一份包括建议教育部组建专门负责健康卫生教育部门、增加在临床以及学科下不少于一年的通科轮转培养等内容在内的共识报告。

此外，我国教育智库在疫情防控期间还通过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工作，在提升自身大众影响力方面有所建树。一是推出公益讲座，传播理性声音，如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 5 月 12 日发起了“后疫情时代的教育转型与变革”系列公益讲座，面向社会公众传递理性的声音，倡导好的教育理念，寻找教育发展的新机遇。二是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理性观点，如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就在线教育如何走出城乡鸿沟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三是借助自身平台，发出智库声音，如长江教育研究院除了发布一系列的抗疫推文之外，还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 4 期《教育智库战疫专刊》，集中刊发长江教育研究院及其智库共建单位的专家们对于疫情中及疫情后的建言献策文章。四是举办公益活动，直接服务社会，如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 2 月 18 日-21 日、2 月 24 日-28 日组织优秀教师，面向全市毕业班学生开展免费公益直播教学。五是贡献爱心、力量，助力全民抗疫，如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党支部与基建行政处党支部爱心采购湖北特产大米、木耳、粉丝、鸡蛋、蜂蜜等农产品百余件，切实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湖北滞销贫困农户。

六、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的文件频频出台，智库相关研究蓬勃开展，我国智库进入史上最佳发展机遇期。本报告选取 80 家国内外智库，从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等三个层次综合评估其影响力。评价结果显示，和国外知名教育智库相比，我国教育智库在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通过系统、科学的评价反馈，国内智库可以学习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反思自身短板，从而更加稳健地推进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也可以参考课题组关于如何提升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总的来说，中国教育智库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教育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中国教育智库必将不断提高自身的咨询与服务能力，围绕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开展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在国内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出更大影响力，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附录

长江教育研究院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 2006 年 12 月 16 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众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十三余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贡献力量。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 MRPA 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MRPA 资源效能测评全国第一。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2018年在中国智库索引社会智库类 PAI 值评分榜全国第二。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智库。

方略研究院

方略研究院是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总部设于北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分站。研究院设有专业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和特约顾问委员，连通政策管理、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多方视角，通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研究分站，携手教育研究员针对高校战略与管理、学科与科研建设、学生培养等教育

主题，进行严肃的调研和科学的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范式，活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提炼形成研究结论和观点。

方略研究院曾参与多项国务院、科技部、教育部、教育厅、国内外高校及高中的教育研究课题与咨询项目，对全球教师人事制度、全球招生与评价、全国高校中外交流合作项目、全球和一带一路教育智库评价等进行专题研究，提交内参专报曾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有关负责人等领导的批示、采纳。

方略研究院旗下拥有专注于教育的研究性媒体“一读 EDU”为代表的媒体矩阵，通过提交内参文件、发布研究报告和榜单、参与承担课题和项目、组织行业活动和专业会议、提供专题策划和宣传报道等多种形式持续发声。同时，依托自身的数据、技术优势，方略研究院还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组织等提供双一流、国际化、人才培养、教育质量保障等主题的线上、线下解决方案，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者提供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应用的研究支持；协助教育决策从战略到战术的落地执行；加强对教育决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有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的开放式智库共建和协同合作。

● 联系我们

如希望获取报告、进一步了解方略研究院业务或对研究课题、产品及其他业务有合作意向, 欢迎发送邮件到邮箱:
research@squareedu.com进行洽谈

研究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液晶大楼

邮编 100084

研究院北京总部电话:

010-6278-8710